

历史文化视角下韩国民族性格矛盾性分析

国清华

吉林大学, 吉林省长春市, 130012;

摘要: 韩国民族性格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鲜明的矛盾性, 承载着韩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记忆。本文从历史文化视角对韩国民族性格的矛盾性进行分析, 将其概括为开放与排他、自信与自卑两对矛盾, 详细说明这种矛盾性的“事大主义”政策历史成因、具体表现及对本国和国际社会的双重影响, 旨在从历史文化纵深层面揭露韩国民族矛盾性的生成机制和现实影响, 为理解韩国社会思维方式、行为逻辑提供独特方法, 促进跨文化交流与国际合作。

关键词: 韩国民族性格; 矛盾性; “事大主义”; 具体表现; 双重影响

DOI: 10.64216/3080-1486.25.06.052

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 韩国在全球视野中呈现鲜明张力: “韩流”席卷亚洲乃至世界的文化输出显强烈自信, 意图在文化归属中取得主体话语权的行露极度自卑; 对西方文化兼容并包的文化现象中, 开放、包容的形象跃然纸上; 强化韩美同盟以应对中国等邻国崛起的表现中, 狭隘、排他的心理显露无疑。这些自相矛盾的外在表现不只是现象, 更反映出韩国民族性格的矛盾性。学界对韩国民族性格的解读常停留在归纳、罗列和总结, 并未对其中呈现的对立统一的矛盾性作深入的分析。民族性格的形成是长期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 因此, 本文从历史文化视角入手, 剖析韩国民族矛盾性的产生机制、具体表现和双重影响, 可为理解韩国社会、促进跨文化交流提供参照。

1 韩国民族性格矛盾性成因: “事大主义”政策的历史演变

韩国民族性格矛盾性最直接的成因是“事大主义”政策。事大主义是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 是基于强弱力量对比情况之下小国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策略, 特指1392年-1895年朝鲜王朝对中国明朝和清朝朝贡的外交政策。小国侍奉大国, 所以对于大国的衣冠体制, 小国引进学习并尊其为正统; 对于除大国外其他国家甚至包括的制度和文化的, 小国会产生鄙视和排斥的心理。这种“事大主义”政策的形成和演化与中原王朝与朝鲜王朝的宗藩关系和由此形成的朝鲜型华夷观念、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密切相关。

古代中国与朝鲜王朝的宗藩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朝鲜型华夷观念推动“事大主义”政策形成、巩固和强化。有明一代时, 朝鲜王朝表现出亲附明朝、感念明朝的态度。朝鲜王朝始终对明朝抱有慕华之心态, 行事大

之礼节, 此时的朝鲜型华夷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可概括为尊明慕华、鄙胡攘夷; 明清易代后, 朝鲜王朝仍然奉行明朝正朔, 并以“反清复明”为己任, 此时的朝鲜型华夷观念与中国传统华夷观出现冲突, 通过是否继承明朝衣冠体制判定“华”“夷”, 即将全面继承明朝体制的朝鲜半岛尊为名分上的“华”, 称作“小中华”, 表现出了强烈的自豪感。这些都体现了朝鲜王朝对中原王朝无法割裂的依赖性, 从而推动朝鲜王朝坚定不移地对中国“事大”, 而这种依赖性和“事大”也成为韩国民族性格矛盾性的主要推手。

日本在朝鲜半岛推行的殖民统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事大主义”政策的影响力。中日甲午战争中, 清政府战败, 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条约第一款便废除了中国同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 由此, 朝鲜半岛进入日本殖民时期, 延续了数百年的华夷秩序最终解体, 依附于这一载体的思想体系“华夷观”随之分崩离析。于是, 朝鲜士人对当时的中国政权产生了极度排斥的偏激心理, 从“高山安可仰, 徒此揖清芬”到“嗤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 甚至无所不用其极的践踏。野蛮的侵略为朝鲜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法磨灭的心理创伤, 深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朝鲜半岛民众的自我觉醒, 他们开始批判“事大主义”政策, 构建民族主体意识, 强化民族认同感, 一定程度上冲破“事大主义”政策的限制, 为朝鲜半岛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奠定思想基础。

然而, 弱小的国家实力和从未真正独立过的政权使朝鲜半岛很快成为美苏冷战的牺牲品, 朝鲜韩国南北分治时代来临并持续至今。建国之初的韩国站在朝鲜战争的废墟上, 积贫积弱的自身与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国家间形成的巨大落差和失去宗主国庇佑的无所适从感迫使其再度“事大”——巩固韩美同盟。因此, 此时韩国继

续奉行“事大主义”政策，其本质没有变化，只不过“事大”的对象由中国变成了美国。而朝鲜型华夷观念虽早已分崩离析，但朝鲜型华夷观念在数百年来为韩国民族巩固的慕强排他心理并未消失，也成为了韩国再次滑向“事大”轨道不可或缺的助推器。

从日本殖民时代到南北分治时代，“事大主义”政策受到一定冲击但很快再次为韩国所奉行是历史发展无法避免的结果，朝鲜型华夷观念中的“华”的身份和地位顺应世界格局变化，由东方转向西方，继续为“事大主义”政策提供生存土壤，并强化了韩国民族性格的矛盾性。

2 韩国民族性格矛盾性概述：开放与排他，自信与自卑

韩国民族性格的矛盾性集中体现在两对矛盾上，一对是开放与排他，一对是自信与自卑。下面阐述两对矛盾的形成和具体表现。

开放与排他之所以能够同时存在于韩国民族性格中，是因为“事大主义”政策的两面性。首先，“事大主义”政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事大”，在对大国、强国的崇拜心理作用下，韩国积极引进学习“事大”国文化，具有将“事大”国文化迅速融入到自身文化中并一定程度上保留自身文化特色的能力。比如朝鲜王朝时期，朝鲜半岛在全面接受明朝衣冠体制的同时颁布《训民正音》、创制本国文字；南北分治时代，韩国效仿美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也根据本国国情重点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汉江奇迹”。然而，“事大”伴随着“鄙小”，韩国虽对“事大”国制度和文化的开放态度，但对“事大”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文化嗤之以鼻。古代朝鲜得意于与中国同文同轨，排斥中华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形成极为扭曲矛盾的朝鲜型华夷观念，除了同中国进行朝贡贸易之外紧闭门户；现今韩国推行“去中国化”，巩固韩美同盟以遏制中国等邻国崛起，其经济爱国主义和民族造史运动也有着极端化的倾向，普通韩国人在表达诉求时的激烈性往往令人瞠目，展现了其极度排外的心理。

自信与自卑并存的民族性格与“事大主义”政策有关，更是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韩国民族性格中的自信一部分源自本国文化，一部分源自“事大”国文化。韩国本土便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如较为系统的表音文字——韩文，传统的音乐形式——伽倻琴、潘索里（Pansori），独特的饮食——韩式烤肉、拌饭以及闪耀人道主义光辉的“弘益人间”思想，这些璀璨多姿的文化是韩国民族的骄傲；而“事大”国制度文化为本国带来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样激发了韩国民众的自信心、自豪感，如朝鲜王朝时期太

宗仿照明制确立了崇儒排佛、重农抑商、事大交邻三大国策，朝鲜世宗在其父太宗所构建的基础上加以巩固，以儒家的王道政治为己任，缔造了朝鲜王朝的全盛时代，半岛民众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又如美国是现代韩国第二大出口市场，韩国借助美国支持提升本国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同样提高了韩国民众对本国经济的自信心。

但是，在许多时候，韩国民族总会流露出深深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来自于巨大的历史惯性：古代朝鲜对中国的长期依附使其以中国为尊，以本国为卑；近代日本等帝国主义势力对朝鲜半岛的强势干预使近代朝鲜民众认清本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后产生巨大的耻辱感；现代韩国采取多种方式获取美国支持谋求本国经济发展本质上是其延续多年“事大主义”政策的变种。由此，韩国民族性格自卑的一面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无法消除，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第一是全面否定朝鲜半岛独立前的历史：由于长期依附和被日本殖民，韩国对朝鲜半岛独立前的真实历史一直持回避态度，甚至不断强化历史的“悲惨记忆”，不惜歪曲事实，篡改历史，根植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悲情主义，如日本殖民时代朝鲜士人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将中国视为阻碍自身发展的一大仇敌。第二是对本质相同的历史事件表现出肯定和否定自相矛盾的态度，如明亡后的朝鲜型华夷观念中，朝鲜半岛已肯定自己“华”的正统地位，却又只是将自己定为名义上的“华”，称自己为“小中华”，内心深处仍然将己视为蛮夷；又如韩国认为古代朝鲜亲附中国属于“事大主义”政策，却又认为现今韩国依靠美国不属于“事大主义”政策。

总之，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开放与排他、自信与自卑为韩国民族刻上了深深的烙印，塑造了极具矛盾性的民族性格，既作用在外在表现上，也作用于内在心理中。

3 韩国民族性格矛盾性的双重影响

韩国民族性格的矛盾性决定其影响具有性质上的双重性，即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因为韩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拥有部分话语权和国际事务参与权，其民族性格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方法，所以就地域来讲，韩国民族性格矛盾性的影响也分为国内影响和国际影响，下面从性质与地域两个维度阐述韩国矛盾性民族性格的影响。

对于韩国国内，民族性格的矛盾性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同样明显。

开放自信的民族性格促进了韩国对先进制度和文化的吸收和本土化并助力本国发展：如朝鲜半岛三国时期的新罗、百济、高句丽吸收儒家治国思想并结合本土特色建立了十二官阶品、州郡县等国家制度；又如吸收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忠君爱国思想并结合自身发展需要，

构建现代韩国的爱国主义和国家集体价值,推动现代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汉江奇迹”经济发展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韩国民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爱国精神;再如韩国积极吸收欧美文化并结合自身文化特点发展了韩国流行音乐文化,提高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使韩国成功跻身于世界文化强国。

排他自卑的民族性格阻碍韩国独立自主的进程,始终未形成对与本国相关的历史和多元文化的正确认识。如朝鲜王朝自居“小中华”并鄙视周围少数民族文化甚至自身文化,导致古代朝鲜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中国的附庸,丧失了独立发展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实力,甚至需要依靠明朝军事力量,平定“壬辰倭乱”,收复领土;又如现代韩国巩固韩美同盟、盛行欧美文化,依靠美国军事力量抗衡朝鲜,其语言中“外来词”泛滥,文化西化现象严重,且拘泥于对历史问题的片面的、选择性的记忆而不能全面正视过去,对自身的的历史和现在的身份过于敏感,大搞“去中国化”并不惜歪曲历史,强化受害者情结。

对于国际社会,韩国民族性格的矛盾性带来的影响也各有利弊。

一方面,韩国民族性格中的开放性、多元性、可塑性和其能够保持自身文化底蕴的自信推动了世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为韩国塑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如朝鲜王朝时期,朝鲜士人对认为是先进理念的程朱理学采取开放态度并结合朝鲜自身实际政治、文化、经济需要,形成了具有本土化特征的朝鲜性理学,典型代表是李退溪(李滉)和李栗谷(李珥)的退溪学和栗谷学两大性理学派,其理气观、心性论、修养论丰富了理学的内涵,对世界儒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又如上文中提到的韩国流行音乐文化不仅极大地增强了韩国国民对自我文化和国家的认同感,也在世界上为韩国塑造了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了韩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另一方面,韩国民族性格的排他性与自卑性在现代韩国演变为极端保守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影响着韩国文化的创造者和政策的制定者,为他国带来伤害。因为自卑,韩国总在积极寻求一种自我认可和他人认可,试图担当与自身国力不匹配的“东北亚均衡者”的角色,增强在东北亚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为达成此目标,韩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战略上排斥别国、倒向美国,甚至默认美国的非正义行径,并制造中韩之间的摩擦与矛盾和中韩关系的不和谐声音。如韩国《朝鲜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将文在寅总统的“中韩是命运共同体”的说法自贬为“大山中国面前的小国韩国”,对于“小国”身份的狭隘的自卑感阻碍中韩间平等友好合作;又如韩国无端将其他国家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据为己有,造成

中韩两国间的许多误会。

韩国矛盾性民族性格对国内和国际带来的双重影响持久而深远,但若想在思想文化、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上取得质的突破,韩国需要扬长避短,发扬积极影响,克服消极影响,这一过程依然任重而道远。

4 结论

韩国民族性格的矛盾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由于巨大的历史惯性,这种矛盾性将在很长一段时间持续存在。古代中国同朝鲜半岛的宗藩关系、由此形成的朝鲜型华夷观念、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促进韩国“事大主义”政策形成、巩固、变形和强化。数百年来,“事大主义”政策中“事大”“鄙小”的基本思想渗透在韩国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形成了韩国民族性格的矛盾性——开放与排他并存,自信与自卑并存,具体表现为对“事大”国的开放和对非“事大”国的排斥,对本土文化和融入到本国文化中的“事大”国文化的自信和对小国身份、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敏感与自卑,其产生的国际国内影响也具备明显的双重性。

历史上长期的依附关系、尚未明确的世界认知、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使韩国很难跳出“事大主义”政策,也就很难摆脱民族性格中的矛盾性,若想彻底克服民族性格矛盾性带来的消极影响,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韩国无法克服弊端,若韩国能够立足现实、确立符合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国家意识,则可消弭盲目排外、走向兼收并蓄;若韩国能够客观地看待历史、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则可真正摆脱自卑、变得从容自信。

参考文献

- [1] 郭锐. 韩国周边外交的理念沿革及其政策调整. 当代韩国. 2019.
- [2] 王箫轲. 民族性格与国家理性之迭变——评《当代韩国民族主义研究》. 当代韩国. 2015.
- [3] 续斗. 民族主义与二战后韩国的社会发展. 南京师范大学. 2016.
- [4] 王曰美, 章治. 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 东岳论丛. 2023.
- [5] 王曰美. 儒学在朝鲜半岛三国时期的传播与本土化. 国际汉学. 2020.
- [6] 范靛. 朝鲜型华夷观与韩国民族主义关系探究.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 [7] 邹磊. 韩美经济合作新动向及其对华影响. 东北亚论坛. 2023.
- [8] 张立文. 李退溪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 学术月刊. 2022.